“凝固的叹息”与“流淌的自强不息”

——浅析康梁二人缘何相聚又分离

史海沧沧，自光绪十六年康梁二人相识于上海起，历经万木草堂的师生之谊，公车上书与戊戌变法的惺惺相惜，流亡海外的相互挂念，辛亥革命后的争锋相对，康南海死后梁任公的悲痛惋惜，二者的人生道路聚散离合，命运交织纵横，各自在“老大中国”向“少年中国”行进的过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然而，史海滚滚，康有为终其一生没能走出他四十岁时的心心念念，囿于《三世说》、《公羊学》等桎梏，抱着“虚君共和”的执念病逝青岛。戊戌变法俨然成为其人生的高光时刻，其后的人生逐渐昏暗，黯淡无光，直至去世，令后人悲叹、哀婉而争论不休；梁启超的人生传奇则自公车上书而始，戊戌变法仅仅是他灿若星辰人生的序幕。饮冰室主人，其思想之进步，人格之高尚，治学之巍然，百年后的今天仍令人感佩。令人不免心生疑惑，二者皆为当世一代宗师，缘何相聚，又缘何分离？

析其本源，笔者认为此乃“流质”与“凝质”之间的差异性使然。[[1]](#footnote-1)康有为晚年时寄信梁启超，言“汝真一极流之质, 吾一凝质, 望汝后勿再流而已”，[[2]](#footnote-2)斯言不惑。所谓“流质”，指“具有一定可流动性的液态物质”，这正符合古人对“上善若水”的推崇，也可作为任公一生的写照。而“凝质”，此处应指“凝聚的固态物质”，康有为言他一生的学识自三十岁起便不应再变，也不会再变。不应再变，几分狂傲；而不会再变，无法再变，又让后人读出几分悲凉。若将康有为的人生视为“凝质”，那么他的人生便是“凝固的叹息”，仿佛一声悲叹于历史长河中，自此喑哑无声。一声悲叹，悲叹改革无方，皇权凋敝，救国之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仅此而已。而若将梁启超的人生视为“流质”，那么他的人生便是“流淌的自强不息”。映照着他在清华学堂以《君子》为题的振聋发聩之谈，也是高度凝练的概括了他善于思变，时时自新的人生。后文将逐一加以例证。

1. 聚为知己：超然贴括之外，当义无反顾

笔者认为，性格本差异巨大的二人聚为知己的本源，在于19世纪末，康有为独到的“凝质”思想——君主立宪，救亡图存——极大地吸引并启迪了少年梁启超。启超者，“流质”也，海纳百川，上善若水，萃万物之精华，走新进之路，从师康南海，当义无反顾矣!

自上书不达，康有为黯然离京返粤，痛感民智未开，孤掌难鸣的唯一改变之道便是亲执教鞭、传播学识、推动维新。恰其时也，少年梁启超正是喷涌的源泉，迫切地汇聚着四方而来的新潮，奔腾不息。机缘巧合，因陈通甫引见，梁启超结识了恩师康有为。一个偶然，结出了此后几十年难解难分的必然。少年梁启超心中旧学的壁垒一朝间彻底破碎。“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，吾与子今得师矣!”[[3]](#footnote-3)康学于梁启超而言，是超然贴括、训诂之外的新鲜的知识与生命。

人生的道路自此另有风采，亦然会有艰辛与跋涉。

古木参天，清幽明丽，万木草堂，新生伊始。于此，梁启超不再摇头晃脑，死背经书，而是与康有为师生同堂，读书论著，相与诘难，也纵论天下、思考家国前途。多年后，学子们无不以康圣人门下高足自居，以改变时局推动维新为义不容辞之己任。梁启超亦其中一员。万木草堂不仅改变了梁启超的学习方法，求知、救国救民、改造社会等家国大任亦汇入梁启超心海。昔时前人抚今追昔，钩沉历史时，往往只记得疾风骤雨，而忘了水滴石穿。正是在万木草堂，康有为的思想一点一滴浸润着梁启超，心田花开，水滴石穿。

康有为无疑树立了全新的师者形象：古今思想，博采百家，中西融合，着力当世。交相辩驳，谈笑风生，慷慨激昂，引经据典。草堂里，满堂哗然，也是满堂生机，直至声震林木。

梁启超也心中感喟，何日吾乃如吾师耶？

秀月山上月，万木草堂风。这就是不新不旧不中不西亦新亦旧亦中亦西的万木草堂，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，梁启超在此得以“万木森森散万花”。于康有为而言，万木草堂不只是学堂，更是“堡垒”，他自幼苦读而得的博学，他对现实世界深刻的洞悉与怀疑，在古今得失中的诸多见解，都在此宣之于众，并广纳百家之言。

世纪末的风风雨雨涤荡着梁启超，中华民族的苦难深重无时无刻不在心中呻吟。接受了康学的洗礼后，等待梁启超的将是大荣大辱，大起大落。四年间，昔日少年举人，博古通今的梁启超从师康有为，深知自己的学问与康有为相比实在差之千里。筚路蓝缕，玉成启超。登高一呼，正其时也!

1. 振臂高呼后：渐行渐远渐分离

四载师生情谊，康门高足无疑成为梁启超一生的烙印。而其后，梁启超渐渐超脱康学，与恩师渐行渐远。这源自于“凝质”性导致康有为中年以后执拗乃至墨守成规，而“流质”性却使成人后的梁启超对各式思想观念洞若观火，得以深刻剖析，时时自新。

1898年6月11日，康有为借《马关条约》的余波，得以振臂高呼，实现他的“救世主”的人生理念。“日日以救世为心，刻刻以救世为事”的他登上了人生的制高点，光芒万丈。无奈背离了晚清复杂政治现状的戊戌变法与康有为的《大同书》一般，如同美好的幻觉，转念间破碎。康梁二人随后流亡海外。

康有为手捧号称是光绪帝的“衣带诏”，在海外广为宣传着他的保皇保教主张；与此同时，梁启超博览西方资产阶级的大量启蒙作品，政见显著改变，堪称判若两人。变法之前，康有为的思想裹挟着梁启超，梁启超惟师是从。而在日本，他逐渐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，并以《自由书》为题，写下数篇文章，宣传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等资产阶级思想。这与康有为的“共和思想”逐渐背离。

二人真正在思想上分崩离析实则始于辛亥革命前夕。康有为坚持“三世论”，坚信应以最小的社会牺牲带来社会的变革。起初梁启超亦与康有为意见相合，认可不能推翻清王朝，通过革命来进行社会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本太高昂。那时，他仍以为变法对于清廷是一味太过猛烈的药，放弃变法，不意味着清廷放弃自救，出于本心与师恩，他与革命党人展开激烈的论战。无奈清廷统治阶级过于迂腐，历尽波折、费劲“千辛万苦”才派出的留洋考察使者最终竟得出结论：君主立宪不适应大清国情。世人昔日以为“立宪拯救中国”，而今大失所望，梁启超亦然。时间推移，越来越多青年人奔向革命党，革命党的组成也越发多样化，广泛来自社会各个阶层。梁启超终于觉悟，除非革命，寄希望于清廷自新来救这“老大中国”必不可能。三分无奈，七分决然，梁启超的政治主张由保皇转向革命，并开始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密切来往。康有为在得知了梁启超的思想倾覆后，暴怒不止，痛斥其倡导革命的错误理念。出于多年来对恩师康有为的敬畏，他只得表面答应悔改，实则已坚定信仰革命。

1911年10月10日，武昌起义爆发。梁启超主张“和袁慰革，逼满服汉”，康有为仍坚持所谓“虚君共和”，二者矛盾越发尖锐。民国成立后，康有为“尊孔保教”，积极复辟，先为袁世凯利用，之后又参与谋划“张勋复辟”的闹剧，逆历史滚滚之潮流。梁启超则坚持维护民主共和，针对喧嚣甚上的复辟逆流，梁启超挥笔书就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。康有为在《上海周报》发表文章《为国家筹安定策者》，梁启超则发表《辟复辟论》，终于将矛头直指康有为，痛陈其师“大言不惭之书生，于政局甘苦，毫无所知。”[[4]](#footnote-4)他明确表态，师生情谊也不绝能使自己成为老师一般的民族罪人。而康有为则痛斥梁启超为“梁贼启超”，二人终于公然交恶。

革命前同仇敌忾、勠力救国的二人却在革命后走向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。

站在康有为的视角，“凝质”本性必然导致其政治理念与君主密切相关。无论是光绪还是溥仪，君主才是康有为政治思想的核心，他无法从坚持了数十年的理念中脱身，与其接受革命与共和，他宁愿选择复辟，单纯地渴望把20世纪的政治问题化归到19世纪末的语境下解决，然而时代的复杂性与异化程度早已不可同日而语。

与此同时，梁启超的“流质”本性与超然的洞察力也决定了在任何时刻，他的思想始终维系着拯救当世中国的最佳路径。变法之前，革命成本太高，与雄心勃勃的光绪帝一同改革社会制度无疑是不二良方。而变法之后，世人皆意识到了清廷顽固统治阶级的思想之腐朽不堪，变法俨然无以救中国。而康有为仍固执地坚持变法，逆时代之洪流。梁启超经过思想斗争后终而选择了切实可行的革命救国之路。

1. 后世之思：“流质”为何会成为“流质”

总而言之，究其一生，康有为都没能走出着他脱离现实的执念，渴望温和地改变政体，“虚君共和”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对梁启超而言，戊戌政变却只是他漫漫人生中的一页。或者说，康有为的人生巅峰仅仅是他的人生起点而已。固执乃至几分迂腐的“凝质”最终与善变的“流质”分道扬镳。康梁的联系，陌路时乃至仅剩残存的些许师徒情谊。

每每有人批评梁启超善于政治投机，善于寻求机会。但我认为，站在梁启超的立场上，他的一切决定皆是遵从内心的。变法刚破灭时，反对革命党是真诚的，辛亥革命前夕认可并坚守民主共和也是真诚的；少年时积极汲取西方文化是真诚的，遍历西方后认为西方文明已死也是真诚的。任公思想的“流质”性，究其本源，乃是梁启超对于东西文化皆有其深刻的洞悉，绝非所谓的学贯中西，而是对中西文化的深入剖析。相较于同时代大多人，包括他的恩师康有为，他更为接近东西文化各自的内核。而其余大多学者，仅仅只在某个领域、某个维度接触过东西文化，与他的洞悉自然相去甚远。故而，当各式思想与政治派系相互争斗时，梁启超总能及时发现何者更为适宜当下之中华。出于此，他要么成为各派争取的对象，要么成为各派争相批判的对象。千年未有之大变革下，他总能及时洞察每种政治主张背后的合乎东方或者西方文化的道理。在不同的境地下，他深刻地理解到各个流派自身的局限性与合理性，并付诸行动。“流质”性乃梁启超遗世独立、超然世人的本源。

可惜，“流质”性或许也是梁启超的莫大遗憾。终其一生，他没能将自身所意识到的丰富的合理性与局限性，内化为完整的思想体系。或许，梁启超的墓碑上，没能留下一段评价性或者总结性的文字，正是梁启超对自身局限性与合理性的独到理解。

总有人感慨，梁启超若不是因为医疗事故病逝，或许可以将自身的思想“凝质”化为完整的思维体系，也许现在世人便可研习“梁学”如同研习王阳明“心学”一般。可我仍然认为，假以时日，梁启超依然不会将自身的理念“凝质”化。如果将康有为喻为“凝质”或者说“死水”，那么梁启超便是“流质”或者说“源头活水”。“流质”，正是梁启超遗憾之处，也是他人格中最大的光芒。

四.结语

综前文所述，康梁二人的聚散离合乃“流质”与“凝质”之间的差异性使然。聚为知己，少年梁启超与中年康有为皆怀抱着君主立宪以救中国的至高理想。散为道不同，康有为抱残守缺，坚守着不适宜“老大中国”的君主立宪，郁郁终生；梁启超则积极地接受时代的变革并不断探索那独属于冉冉新生的“少年中国”的变革之路。

“流质”或许是梁启超一生的遗憾，但笔者认为，此确为其人生闪耀之光芒！

1. 王明德：《凝质与流质之间——康有为、梁启超的个性差异与其不同的政治境遇》，《河海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,2007年第1期，第77页.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康广仁：《与何易一书》，张元济编著；《戊戌六君子遗集》，台北:文海出版社, 1966年，第65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梁启超：《三十自述》，崔志海编著；《梁启超自述》，郑州，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，2004年，第16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解玺璋：《梁启超传》，上海；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，2012年，第46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